

「跨國婚姻的組成差異與生育影響： 南韓與臺灣經驗」演講紀實

呂采穎*

* 臺灣人口學會助理，通訊作者
E-mail: tsaiyinglu@gmail.com

收稿日期：2018.04.25；接受刊登：2018.04.30

臺灣人口學會於2018年4月13、14日，假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舉辦2018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人口結構的轉變與轉機：年齡、性／別與族群」學術研討會，並藉由本次機會，特別邀請南韓漢陽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同時也是亞洲人口學會理事長的Doo-Sub Kim教授（以下稱金教授）來臺擔任專題演講者，並另於4月12日在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演講內容則是針對跨國婚姻的不同面向進行討論，題目分別是“Does Spousal Dissimilarity Matter? An Analysis of Marital Dissolution among Transnational Couples in South Korea, 2004-2014”與“Neighborhood Effect of Ethnic Composition on Fertility of Marriage Immigrant Wives: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and Taiwan”。

金教授近十年的研究致力於觀察全球化趨勢下，南韓境內跨國婚姻現象裡的人口特性及發展，亦關注南韓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脈絡下所產生的人口問題。首先在“Does Spousal Dissimilarity Matter? An Analysis of Marital Dissolution among Transnational Couples in South Korea, 2004-2014”演講中，金教授描繪出自1990-2016年間東亞地區（包括南韓、日本、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等國）的跨國婚姻圖像，並指出在2004-2006年間，各國外籍配偶的數量皆出現明顯的高峰，亦說明2004年後跨國婚姻與婚姻移民現象已成東亞地區婚姻組成的重要趨勢。

金教授更進一步指出，在尋找婚配的方式上便能看出東亞地區明顯不同於歐洲跨國婚姻的組合模式：歐洲地區較多基於地緣性，南韓與臺灣男性則多偏向以生理與文化相似性尋找外籍女性婚配，而這樣的選擇亦創造出東亞地區跨國婚姻的特殊性。例如本國男性與女性在選擇外籍配偶上有其人口特性差異，低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的男性較難在當地成婚，因而有較高比例轉向尋找外籍配偶，且多自相對貧窮之國家尋得。

其中，以南韓經驗來看，在女性外籍配偶中，中國與越南為主

要輸出國；男性外籍配偶的國籍則主要為中國、美國及日本。另外，金教授也指出跨國婚姻組合在年齡分佈上亦有明顯差異。整體看來，南韓男性多與較年輕的外籍配偶結婚，若比較中國與越南（兩大輸出國）女性配偶的年齡分佈，中國女性配偶較多位於20-30歲，越南女性配偶則為18-25歲，且後者年齡一旦超過20歲，人數便呈現急遽下降。

綜合上述，金教授自2004-2014年間政府所蒐集的結婚與離婚註冊資料中，整理出共266,354筆登記為跨國婚姻、65,250筆跨國婚配登記為離婚的資料，比較跨國婚姻的不同國籍組間，其婚姻存續時間（以月為單位）以及離婚率（以累積概率求之），是否因婚配年齡與教育程度而有顯著差異。並據以提出三個研究問題：是否婚配年齡與教育程度的差異將縮短跨國婚姻的存續時間，且（或是）提高離婚的風險？其中婚配差異能夠解釋多大程度的變異？最後，跨國婚姻的運作模式是否明顯異於南韓本國籍婚配？

過往研究在討論跨國婚姻的短暫性或高離婚率時，大致可分為三種觀點，一為異質婚（heterogamy），即主張文化差異是導致高離婚率的主因；二為選擇性觀點，認為應關注結構組成效果（compositional effects）在其中的作用，而非只觀察跨國婚姻本身的異質性；第三種則與離婚成本有關，持此觀點者認為外籍配偶會衡量自身離婚的成本與效益，即相對於已經獲得公民身分的配偶，離婚後需返回母國的配偶之離婚成本便較大，而傾向選擇維繫婚姻關係。

為瞭解影響南韓跨國婚姻能否持續的變數為何，金教授透過參數分析，以婚姻存續時間做為應變項，藉由比較南韓本國籍婚姻與跨國婚姻分別在不同的年齡差距時，婚姻存續時間的變化；以及女性配偶持有的教育程度（國小、國中、高中或大學畢業）在不同的年齡差距上，其婚姻存續時間的長短，以觀測年齡差距的影響效果。研究發現跨國婚姻的組合及無論女性配偶的教育程度為何，在不同年齡差距上的婚姻存續時間變化皆呈現「倒J型」的線性趨勢。也就是說，相較

於同歲的配偶，配偶年齡差距若為女性大於男性2-8歲，則婚姻存續時間較長；但當配偶年齡差距為男性大於女性6歲以上，婚姻存續時間便急遽下降。

接著，同樣以婚姻存續時間為分析目標，並將原婚配年齡差距改為婚配教育程度差距。研究發現，跨國婚姻內的教育程度差距與婚姻存續時間之關係呈負向線性發展，即教育程度差距越大，其婚姻越短暫。

除了婚姻存續時間之外，離婚率也是金教授分析南韓跨國婚姻模式的重要指標。研究比較南韓本國籍婚姻與跨國婚姻，以及不同國籍之女性婚配（包括中國、越南、菲律賓與日本等國）隨婚姻時間延長之離婚率趨勢，並發現跨國婚姻的組合與配偶為中國女性者，離婚率的攀升速度較快。而年齡差距、教育差距與離婚率之間的關係，則可見男性配偶若年紀大於女性配偶超過10歲以上，離婚率較高；教育程度則相反，當女性配偶的教育程度高於男性配偶時，離婚率較高。

更進一步以女性外籍配偶之原國籍做區分，比較中國、越南、菲律賓及日本女性配偶的教育程度與離婚率之間的關聯。統計結果顯示，中國、越南與菲律賓配偶的教育程度較低者，特別是國小或以下者，其離婚率隨時間延長，攀升速度也更快。而兩性教育程度的差距以原國籍區分後，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樣本，若女方為中國籍配偶，且男性教育程度低於女性時，則離婚率攀升較快。

金教授表示，這樣的結果也引導至另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與一位擁有高教育程度的中國女性結婚後，其婚姻存續時間較長，但也傾向較高的離婚率？對此，金教授回應可能有兩個原因，一為目前約莫有3/4的中國女性配偶為韓國裔，二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女性配偶相對結婚較晚、再婚比例較高、且（或是）較可能獲得韓國公民身分。

整體來說，相對於本國籍婚姻，跨國婚姻傾向存續時間較短、離婚風險較高。其中，若配偶為中國籍女性，則維繫婚姻的時間較長，同時離婚風險也高；若為日本籍女性，則相對婚姻時間延續較長，且

離婚風險也低。若從離婚率來看，女性配偶的教育程度具有較穩定的影響效果，即教育程度與婚姻存續時間具正向關係，教育程度越高，存續時間越長，離婚風險也顯著較低。至於婚姻存續時間的部分，兩性配偶的年齡差距與婚姻存續時間呈「倒J型」關係；教育程度差距則是負向線性關係。可見跨國婚姻中兩性的年齡與教育程度差距為影響婚姻解組的重要因子，且當年齡差距越大，婚姻存續時間越短，離婚率越高。基本上研究成果支持選擇性問題與離婚成本的觀點，因當控制了配偶差距之後，女性配偶所屬國籍的影響力即顯著降低，且在跨國婚姻中，獲得公民身分與否做為婚姻中重要的考量之一，可解釋為什麼婚姻存續時間與離婚率會隨著女性配偶的國籍、教育程度而產生變異。

延續跨國婚姻內部異質性的討論，金教授於4月13日「2018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專題演講則是從基本人口變項的差異與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來談南韓與臺灣外籍配偶的生育狀況。首先金教授指出，1990-2016年間，南韓與臺灣在跨國婚姻的數量（每1,000對婚配中為跨國婚姻的數量）上有顯著的變化。臺灣自1998-2003年間跨國婚姻數量皆高於南韓（每1,000對中有20-55對為跨國婚姻），2004年則出現轉折，南韓跨國婚姻數量攀升至30對以上（臺灣為30對），且直至2016年皆高於臺灣的數量。但整體而言，臺灣境內跨國婚姻所占的比例仍高於南韓。而根據2015年的統計，南韓境內有20,000名所謂「新住民第二代」出生，占該年總出生嬰孩的4.5%；臺灣在2016年則是有12,883名新二代，占當年度出生數的6.2%。

為瞭解外籍配偶所居住的鄰里環境組成是否會影響其生育意願，金教授透過結合不同層級的縣市資料（包含市、縣與區）與調查資料，採用個人單位與總體層級單位進行分析，並試圖回答以下四個問題：對外籍配偶來說，居住區附近的鄰里組成是否重要？假設鄰里效應有具體影響，那麼友善的鄰里組成是否會影響其生育決定？又是反

映在多少生育數或生育頻率上？而外籍配偶的聚集會有什麼樣的短期影響？長期而言，這樣的族群組成環境又會對當地外籍配偶的生育有什麼影響？由於居住地區的鄰里組成對外籍配偶來說，是與原生地民眾接觸與交流的重要管道，且居住環境對待不同國籍的友善程度，也是影響該地居民行為的重要因子。

若要瞭解不同地區跨國婚姻生育狀況的分佈關聯，結合既有空間分佈資料與個人層次的調查資料是關鍵的分析取徑。更進一步來說，金教授認為若該地區有較高比例的外籍人口，將會增快外來人口適應當地文化與社會的速度，並提高其居住滿意度，因此可能間接促使外籍配偶願意增加生育數及頻率；若居住地區同裔人口增加，則會增加外籍配偶對原生文化的依附與認同感，反而會降低其生育數與頻率。據此，金教授從兩個方向分析地區的族裔組成，一是流動性（flow measure），自一個地區人口流動的進與出，做為族裔組成的指標；另一個指標是存量（stock measure），即長期來看一個地區所累計的族裔人口數量。

為比較南韓與臺灣的異同，在南韓方面，本研究使用2009年韓國多元文化家庭調查（Korean National Multi-Culture Family Survey）、2009年官方統計結婚與離婚的登記資料，以及2009年官方統計的地區人口數資料；臺灣部分則採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2013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資料，及2013年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合計南韓共有47,007個女性外籍配偶樣本，臺灣則有12,924個樣本。除了考量個人的年齡、教育年數與工作狀態外，同時計算出南韓在2009年共251個鄉鎮縣市中，女性外籍配偶遷入該地區的比例做為鄰里效應的流動性指標，以及該地區原有的族裔組成數量，包含中國籍、越南籍、菲律賓籍及蒙古籍等為鄰里效應的存量指標；另外，出生嬰孩數、結婚至第一胎出生的間隔時間（以月計）、第一胎與第二胎出生的間隔時間（以月計）皆是本研究採用的重要變項。臺灣部分則因資料限制，金教授計算出2013年共22個縣市中該地區原有的族裔

組成數量，且主要是中國籍住民的比例；另外也整理出生嬰孩數及第一胎與第二胎出生的間隔時間（以月計）。

迴歸分析與多層線性模型的結果均顯示，在南韓，地區的族裔組成對女性外籍配偶的生育狀況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例如當該地區擁有較高比例的跨國婚姻配偶，其生育數也會提高，尤其菲律賓女性外籍配偶最明顯，越南籍與南韓中國籍配偶次之。鄰里效應也明顯反映在當該地區來自相同原生地的族裔人口越多，該國籍配偶的生育數則越低，呈現負向線性關聯。表示在控制其他條件變異的狀態下，外籍配偶對於原生國的文化歸屬與認同感會因其居住的鄰里環境而有差異，甚至會反映在外籍配偶對生活的滿意度上，且同樣是負向關聯。然而，鄰里效應在臺灣的資料中則較不明顯，僅有居住在臺灣南部且配偶為非白領男性的生育狀況與南韓相似。

臺灣與南韓分別在20世紀末前後邁入高齡化社會，且同樣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外籍配偶與新住民議題如何妥善理解與處理，是兩國須面臨的重要課題。金教授的兩場演講分別就南韓目前跨國婚姻與婚姻移民的生活狀況進行詳細剖析，並透過整理官方統計與社會調查資料，描摹出東亞跨國婚姻的圖像。基於南韓社會條件與臺灣的相似性，相信日後對於擬定臺灣相關政策上有極大的參考作用。